

嘉靖隆庆年间白莲教对板升的影响

吴秀春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嘉靖隆庆年间白莲教教徒对于建立板升带来了深刻影响。土默特地区蒙、汉文化长期的共存与交流, 形成了既不同于蒙古游牧文化, 又区别于汉地农耕文化的独特地区文化。板升的建立和发展, 不仅推动蒙古社会发展, 也促进了民族融合, 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 白莲教; 板升; 土默特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1368 年 (明洪武元年), 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被推翻, 朝廷退回漠北蒙古高原, 明朝则占据中原地区。北元和明朝至此形成南北对峙状态, 导致战乱频繁。明初对蒙古进行“犁庭扫幕”式的战争, 在这种状况下, 蒙古高原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并且明成祖对蒙古采取了分化瓦解政策, 通过支持内讧中的优势一方, 打击另一方。在这时候蒙古内部封建主之间又发生混战, 这使得蒙古平民与明朝私市贸易被中断, 然而这并不影响蒙古贵族与明廷之间往来, 主要以朝贡和马市的方式进行。但是到了弘治末年, 明朝与蒙古的使臣往来和贸易完全被断绝。因此正德以后蒙古对明朝边境的骚扰和抢掠增多, 更是“隆庆和议”之前, 明蒙关系非常紧张, 这使得边境双方百姓民不聊生, 非常渴望和平共处, 这也使得一些明朝边疆人民被动或主动从明朝边境逃到蒙古地区。这些人们当中有平民、宗教人员、反明人员, 为了安置和开发蒙古地区, 俺答汗在土默特地区建立了板升。这情形直到隆庆年间有所变化, 嘉靖朝时期的绝贡到“隆庆和议”重新开通互市和朝贡。对此影响最大的是白莲教教众。笔者想通过此篇论文, 简述白莲教教众对建立板升的影响。

一、嘉靖隆庆年间的白莲教及进入土默特地区的动机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便开始下令禁止白莲教的传播, 到嘉靖隆庆年间一直沿用着对白莲教的禁令, 这使得成为白莲教教徒从明朝逃到土默特地区的一个推力。

白莲教最早起源于公元1133年(绍兴三年),江苏吴郡祥寺僧人茅子元在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自号白莲导师。茅子元简化了各种繁琐的宗教仪式,适应了广大低层民众的信仰需要。白莲教不要求信奉者出家,且主要的传播者并不是具有较高宗教素养的出家僧侣,而是在家的普通信徒,这使得其传播的教义多与正统佛教相异。然而,宗教具有特殊属性,它作为逃离痛苦现实的精神信仰和寄托,并没有因禁令而销声匿迹,而是一直在民间流传。白莲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弥勒下生”¹“明王降世”等思想。其次,从史料来看白莲教另有说法,在《阿勒坦汗传》写到“返回后不久于白猪年²,异邦汉人毕兰百姓……”。³

白莲教虽产生于南宋初年,但到元朝才得到了发展。到元末时白莲教教徒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深知白莲教的强大威力,便开始下令禁止白莲教的传播。至此在《明太祖实录》中写到,“塑画天神地神祇,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呪水诸术并加禁止”。⁴明朝除了禁止白莲教的传播,还通过奖罚制度来抓获白莲教教徒。对于白莲教教徒采取一经发现,重者绞刑,轻者杖法或发配流放。奖赏制度则对于揭发举报白莲教者,主要通过赏银、赐物或授予官衔来对其进行鼓励。

明朝之初白莲教被禁止传播,因此白莲教开始转为地下传播的秘密社会组织,并在普通老百姓中广为传播。嘉靖朝时土地兼并问题日益突出、又有蒙古对边境不断侵扰,在这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广大被压迫百姓不断发起各种反抗斗争。跟明朝相反的是土默特地区的赋徭较轻,明朝人民来到此地后交赋的粮食之外,还可以满足一家老小的需要。而且在当时大同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如蝗灾、旱灾等),在这种情况下填饱肚子成了最大的问题,普通民众和白莲教徒只能选择叛逃蒙古地区,以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自愿来到土默特地区的百姓是有白莲教徒和普通边境百姓。这些人是因为明朝的政策和赋税等原因无法在明朝境内生存,所以自愿来到土默特地区寻找一线生机。据《阿勒坦汗传》记载:“异邦汉人毕兰百姓……等官员,皆慕君汗之名来归降”⁵“包围汉地……时,酩酊大醉之汉人自行前来投诚”。⁶又据《赵全献牍》记载:“嘉靖二十四年间,有先存

¹ 弥勒下生是指弥勒上生兜率天后,经过56亿年,降生人间,在华林园龙华树下向天人说法,超度信众。

² 即辛亥,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

³ 毕兰百姓是指白莲教教徒。

⁴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中华书局,2016年。

⁵ 《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6节,第49页。

⁶ 佚名著:《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节,第51页。

今服毒已死逆犯周元,系湖广黄冈县人,……。叛投虏地,改夷名大笔写气,向在俺答营教诱侵扰中国”。据《俺答列传·中》记载:“芹,故左卫人,而富亦卫舍余也,夙习白莲教,党与几百,并亡低于虏,自以为次王,与谋中国”。¹但自愿来土默特地区的人还是占少数一部分,更多人是被抢掠来到这里。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勒坦汗统无数大众行兵汉地,越过白墙攻破名为石州之城,虏获金银财物妇幼无算,携带无数虏获品平安归营”。²据《赵全献牍》记载:“嘉靖四十一年间,刘天麒节将抢虏人口并招集叛逆汉人管领二千余名口,伊亦驱使被掳汉人修筑土堡一座,周围二里有余,积有马牛五千疋只,粮米五千余石”。³可见因这些人的到来,牛马、粮食、房屋建筑在不断增多。“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内,各贼满载回营,俺答欢喜,将全封官把都儿哈,管领叛逆并召集被掳汉人一万余名口”。⁴可以看出俺答汗不仅给这些汉人封官而且还封蒙古官名。“隆庆四年二月初七日,节年抢掳汉人并召集叛逆白莲教人等约一万余名”。⁵从这可以看出叛逃到土默特地区的白莲教教徒人数是很庞大的数字。正是因为明朝对于白莲教实行严格禁止政策,加上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明朝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和普通百姓便选择远走他乡,逃到土默特地区寻求庇护,寻找一线生机。

二、板升的建立

16世纪前半叶,自愿或被掠夺的明朝边境普通百姓和白莲教教徒进入土默特地区,在当地发展定居农耕,形成了独特的板升社会。

关于板升的含义,文献记载有如下说法:

①《三云筹俎考》记载“大同右卫边外由王城旧城而北,经二黑河历三百里,其地曰丰州。崇山环舍,水草丰美,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开良田数顷,接东胜州,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⁶

②《明史·鞑靼传》记载:“板升,华言屋也。”⁷

③《大隐楼集》记载:“所谓板升者,何也?曰板升华言堡子也。皆云晋诸

¹ [明]翟九思:《俺答列传·中》,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² 佚名著:《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节,第59页。

³ 《赵全献牍》,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⁴ 《赵全献牍》,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⁵ 《赵全献牍》,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⁶ 王士奇:《三云筹俎考》,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辑,

⁷ 《明史》,卷327,国防研究院印行,1962年。

道筑以自卫，非虏人所据也。”¹

如今对板升的解释也有如下几种意见：

①札奇斯钦在《蒙古文化和社会》中写到：“蒙古语称固定的房屋称为 baishing. 在明代汉文文献中作“板升”，其定义是一般汉地百姓们住的房子，暗中有一点不为游牧君长们所看得起的意思。也有若干阿尔泰语学家认为这是从波斯得语汇中转入的。”²

②哈丹朝鲁在文中写到：“板申”，即汉语“百姓”的音译，是指处于蒙古封建主统治下的汉人佃户而言的，他们多用土木筑房而居。³

③日本的荻原淳平认为：“‘板升’中的‘板’即白，白色的意思，‘升’是‘城’的化音，板升意即白色的城，他的根据是山西大同附近的城是白色”。⁴

笔者对于板升的含义理解是，板升有两层意思，表面意思为“土木砖瓦建造的房屋”，深层意思为“从明朝前往土默特地区的汉人所居住的房屋”。

白莲教教徒对于板升的建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是，在板升地区引进工匠和有才华的人。据《俺答前志》记载：“丘福说俺答大收知略士，悬书穹庐外……。俺答蓄邦奇于账下，其知能不如富，其爱习之则愈富甚”。⁵其次，引导俺答来抢掠明朝边城。因为在之前虽然也对明朝边疆抢掠，但是没有或很少熟悉明境情况的汉人引导，蒙古方面不知边防设置情况，亦不清楚村堡路线，往往胡乱侵扰，规模也较小，很大程度上靠运气。当这些白莲教徒充当向导后，他们熟悉明朝方面的地理，可以更加准确的带领俺答有策略、有目标、有效率的深入抢夺。在《赵全献牍》记载：“全于李自馨各又不合于丘福分遣奸细入边探听虚实，……日逐教诱各夷置造钩杆，攻取城堡”。⁶在《俺答列传·中》记载：“然全与李自馨日夜诱诸夷造钩杆攻城具，声言欲夺我渔阳、云中、上谷地、遂中俺答欢”。⁷再次，帮助俺答汗建立宫殿及其房屋，还带来了垦田耕种技术、手工业生产技术、制造农具。在《阿勒坦汗传》中记载道：“于哈鲁兀纳山阳哈郭木伦

¹ [明] 方逢时：《大隐楼籍》，李勤璞校注，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鱼方氏刻本，（转引许慧君：《明代板升的社会效应与历史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第 23 页。）

² 札奇斯钦：《蒙古社会与文化》，台湾印刷馆，1987 年，53 页。

³ 哈丹朝鲁：《内蒙古农业聚落的形成和主要类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 年，第 5 期。

⁴ 荻原淳平：《アルタン・カーンと板升》，（转引许慧君：《明代板升的社会效应与历史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第 23 页。）

⁵ 冯时可：《俺答前志》，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10，第 125 页。

⁶ 《赵全献牍》，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9 页。

⁷ [明] 翟九思：《俺答列传·中》，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第 65 页。

河边,地瑞全备的吉祥之地,巧修拥有八座奇美楼阁的城市,及玉宇宫殿之情如此这般”¹、“倡修五塔与八大板升,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倡导种植之情如此这般”。²在《俺答列传·中》记载:“而会富有弟曰全,辄习梓人艺,即为答造起楼房三区,其壮丽。已,造舳舻一艘,得度河西兵而东。已,置农器种禾”。³在《赵全献牍》记载:“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献谏,将俺答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拖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殿九间、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驱使掳去汉人,采打木植,于俺答前盖朝殿后盖寝殿土间,东南角建盖仓房三间,有于城上周围建盖两滴水楼五座”。⁴

自愿或被掠夺来到土默特地区的明朝边境普通百姓和白莲教教徒共同创造了板升,还帮助俺答汗建立宫殿及其房屋,而且还带来了垦田耕种技术、手工业生产技术、制造农具,极大地推动了土默特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白莲教对板升的影响

白莲教对于建立板升的影响有促进边疆繁荣和促进民族文化涵化等等方面。在促进边疆繁荣方面,比如说在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1 年)明蒙互市中,俺答曾要求用牛羊换粮食,到隆庆封贡的时候,明蒙双方的谈判中居然没有涉及到粮食问题。这个可以从侧面反映土默特地区的粮食供应是足够的。在《俄国·蒙古·中国》记载:“嘉靖四十六年时,蒙古出产各种谷物,如糜黍、小麦、春播、黑麦、大麦、燕麦,还有多种不知名的作物。当地有洁白上等的馒头。蒙古地方有瓜果蔬菜,在各种园圃中出产苹果、樱桃、瓜、西瓜、南瓜、柠檬、黄瓜、葱蒜以及其他各种蔬菜”。⁵板升百姓开始种植谷麦等粮食农作物,使得食物种类变多,饮食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促进民族文化涵化方面,加强了蒙汉文化交流。比如在饮食习惯、居住习惯、穿衣、饮食文化受社会生产的影响,并随之变化。板升农业兴起之后,饮食逐渐发生改变,从以前“夷人虽知火食,然亦粗糲之甚矣。其食肉,类皆半熟,

¹ 佚名著:《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45 节,第 86 页。

² 佚名著:《阿勒坦汗传》,珠荣嘎译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82 节,第 52 页。

³ [明]翟九思:《俺答列传·中》,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四辑,第 64 页。

⁴ 《赵全献牍》,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编》,第二辑,第 112 页。

⁵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1051 页。

以半熟者耐饥且养人也。肉之汁即以煮粥，又以烹茶”。¹到“隆庆和议”时食物来源扩大，款贡时王崇古就说“今板升农业，亦虏中食物所资”。²蒙汉相处久，形成了当地共同饮食习俗。早茶多饮奶茶，佐乳食、炒米等，和白面用奶水，煮面条加干酪粉或炖羊肉汤。羊肉、奶食、莜面、土豆为日常必不可少。这些饮食习俗至今仍为当地蒙汉民众沿袭。³

服饰的变化也是蒙汉双方交流接触后最为突出的体现。土默特蒙古世代以游牧为生，衣着服饰也适应游牧的生活方式。“凡衣无论贵贱，皆窄其袖，袖束于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则缩其手而伸其袖。袖之制促为细褶，褶皆成对而不乱。膝以下可尺许，则为小墀，积以虎豹水獭貂鼠海獭诸皮为缘”。⁴自俺答兴农后，服饰日趋丰富，渐改“衣以皮为衣”“毡裘不奈夏热”的状况。“隆庆和议”之后，尤多穿布料长袍，束布带。富者也有“衣锦服绣者”。从以上可以看出，土默特游牧文化再吸收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在输出本民族文化，并不同程度保留了本民族游牧文化特点。

综上所述，嘉靖隆庆年间白莲教教徒对于建立板升的带来了深刻影响。蒙汉文化长期的共存与交流，不断接触、交汇，形成了该地区即不同于蒙古游牧文化，又区别于汉地农耕文化的独特地区文化。两种文化不断汲取、汇聚，再造了该地区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具浓厚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新特质。板升在蒙古地区扮演补充单一游牧经济和带动蒙古社会发展的角色。板升的建立和发展，不但推动蒙古社会发展，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¹ [明] 萧大亨：《北虏风俗·食用》，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244 页。

² 王崇古：《散逆党说》，王鸣鹤：《登坛必究》卷 37。

³ 肖瑞玲：《明清土默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内蒙古师大学报》，1994 年第 4 期，第 50 页。

⁴ [明] 萧大亨：《北虏风俗·帽衣》，载《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 244 页。

The Influence of *White Lotus Sect* on the *Bansheng* in the Years of Jiajing and Longqing of Ming Dynasty

Xiuchun Wu

Abstract: In the years of Jiajing and Longq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believers of *White Lotus Societ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Bansheng* (板升). The long-term coexistence and exchange of Mongolian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ümed area has formed a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which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Han farming cultu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ansheng* not only promot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but also promoted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had an indelible impact on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multinational country.

Keywords: White Lotus Society; Bansheng; Tümed

[作者简介] 吴秀春 (1998-), 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2020 届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1-11-10